

今本《论语》传本由来考

黄 怀 信

关于今本《论语》的由来,学术界有不同观点,如杨伯峻先生认为,今本“基本上就是《张侯论》”^①;古棣等也认为古注和“近现代各种《论语》注解本依据的都是《张侯论》”^②。黄立振先生则认为,郑玄本“即是现行《论语》的来源”^③。而《张侯论》及郑玄本的由来与异同,文献又有不同的记载,前人亦有不同的认识。所以,有必要对今本《论语》的由来进行再考证。

今本《论语》的最早完整传本,无疑是晋代何晏等人所撰的《论语集解》本(以下简称何晏本)。唐开成石经虽为白文,但亦冠何晏等人之《论语序》,并署“何晏集解”字样,说明所据为何晏本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论语音义》亦引《论语序》,而且明注“此是何晏上《集解》之序”,说明其所据本亦为何晏本(按:偶有何本所无者,属校补)。邢昺《论语注疏》有《序解》,专解何晏等人之序,说明所从亦是何晏本。所以,今传本《论语》皆出何晏本(按:文字偶有与何晏本异者,属流传异文),当无疑问。何晏本由何而来?《论语序》并无明言。序曰:

汉中壘校尉刘向言:《鲁论语》二十篇。……《齐论语》二十二篇,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《鲁论》。……《齐论》有“问王”、“知道”,多于《鲁论》二篇。《古论》亦无此二篇,分《尧曰》下章“子张问”以为一篇,有两《子张》篇,篇次不与齐、鲁《论》同。安昌侯张禹,本受《鲁论》,兼讲《齐》说,善者从之,号令曰《张侯论》,为世所贵,包氏、周氏《章句》出焉。……汉末,大司农郑玄就《鲁论》篇章,考之《齐》、《古》,为之注。……中间为之训解,至于今多矣。所见不同,互有得失。集诸家之善,记其姓名,有不安者,颇为改易,名曰《论语集解》。

所引刘向之言,无疑出自《别录》。所以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亦云:“《论语》古

①杨伯峻:《论语译注·导言》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②古棣、戚文、周英:《孔子批判·孔子十日谈·第二日》,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1年版。

③黄立振:《〈论语〉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》,《孔子研究》,1987年第2期。

二十一篇,《齐》二十二篇,《鲁》二十篇。”说明三《论》篇数异同无异说。而序于三《论》之外详说《张侯论》和郑玄本之由来与传授,则说明其所据之底本必与二本有关。以理言,郑本近,且已融会三《论》,新本当承郑本。然而序又云《张侯论》“为世所贵”。此言尽管是就当时流传言之,但也可见其主观上有贵《张侯论》的倾向。又云“集诸家之善”,尽管主要指注释言,但于经文亦不可能一点不涉及。看来何晏等究竟所祖何本,诚难简单断言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云:“郑玄以《张侯论》为本,参考《齐论》、《古论》而为之注。”《经典释文》亦云:“郑校周之本以《齐》、《古》,读正凡五十事。”周即《论语序》之周氏,其《章句》出《张侯论》。可见又皆以为郑本就《张侯论》而校,与序“就《鲁论》”之说相左。所以,郑玄本之真正由来,亦待考证。这里,我们先从考郑玄所就何本究起。

欲明郑玄所就之本,须先理清《张侯论》与《鲁论》的关系及异同。

据《论语序》可知,《张侯论》系安昌侯张禹以“本受《鲁论》,兼讲《齐》说,善者从之”而成。关于张禹传《鲁论》,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明确记载。《志》云:“传《鲁论语》者,常山都尉龚奋、长信少府夏侯胜、丞相韦贤、鲁扶卿、前将军萧望之、安昌侯张禹,皆名家,张氏最后而行于世。”所以,谓张禹“本受《鲁论》,兼讲《齐》”,当属可信。但序文并没有说明《张侯论》的篇数,因为所兼讲之《齐论》毕竟比《鲁论》多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两篇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论语》十二家虽有“《鲁安昌侯说》二十一篇”,但并不能证明《张侯论》经文就是二十一篇,因为毕竟是“说”。所以,《张侯论》的篇章又需进行考察。以理相推,张氏既是“本受《鲁论》”,其篇章自当从《鲁论》之旧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云:

张禹本授《鲁论》,晚讲《齐论》,后遂合而考之,删其烦惑,除去《齐论》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二篇,从《鲁论》二十篇为定,号《张侯论》,当世重之。

是《张侯论》篇目确从《鲁论》。孙钦善先生云:“据各种记载,《张侯论》实际是以《鲁论》为底本,并未变乱《鲁论》的篇章。”^①应该是正确的说法。那么序文所谓“善者从之”,就当是从字词言。所以,《张侯论》当是以《鲁论》为底本,参考《齐论》,对个别字词作了校改订正而成。而且只有校订比较合理,优于《鲁论》,才能为世所贵。那么也就是说,《张侯论》毕竟异于《鲁论》。所以,即使《张侯论》出于《鲁论》,也不能既说郑玄“就《鲁论》”,又说“以《张侯论》为本”。皇侃《论语义疏叙》云:“魏末,吏部尚书南阳何晏字平叔因《鲁论》集季长等七家,又采《古论》孔注,又下己意,即世所重者。今日所讲,即是《鲁论》,为张侯所学,何晏所集也。”直以《张侯论》为《鲁论》,应该说是不对的。

^①孙钦善:《四部要籍注疏丛刊·论语·前言》,中华书局,1998年版。

那么郑玄究竟所就何本？郑本原本今不可见。敦煌、吐鲁番虽发现有郑注《论语》残卷，尤其是吐鲁番阿斯塔那 363 号墓出土有唐中宗景龙四年卜天寿所抄写的郑注长卷，但篇题下多标“孔氏本，郑氏注”，所以也不能直接做为参证。唯一可据的，是《经典释文》所保留的相关材料。《经典释文》于《论语》除音注之外，往往还有关于郑本异文的纪录。如于《学而》篇“传不”下云“郑注云：‘《鲁》读“传”为“专”，今从《古》’”；于《公冶长》篇“崔子”下云“郑注云：‘鲁读“崔”为“高”，今从《古》’”；于《先进》篇“而归”以下注“如字。郑本作‘馈’，馈酒食也。《鲁》读‘馈’为‘归’，今从《古》”。后者“《鲁》读”句上虽未署“郑注云”字样，但亦必是郑氏之语，否则即与经字矛盾。可见此处“馈酒食也”以下皆为郑注之语。由此可知，《释文》中凡“《鲁》读（或作）‘某’为‘某’，今从《古》”之语，皆取于郑注。那么郑氏既言“《鲁》读‘某’为‘某’，今从《古》”，就说明他所据的底本为《鲁》，是以《古》校《鲁》。可见《论语序》“郑玄就《鲁论》篇章”之说是正确的，而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以《张侯论》为本”之说是错误的。同时又可看出，郑本多从《古》字。看来所谓“考之《齐》、《古》”，只能是以《古》为主。或者说虽并考《齐》、《古》，但多从于《古》。清徐善源《论语鲁读考》谓郑“所读正五十事，见于《释文》者二十三事而已，皆从《古》也。其从《齐》者当有二十七事”，未免机械。《释文》岂必尽录五十事？《释文》未见一“齐论”之字，又怎知其所录就是《齐论》？所以不可信。王国维《书〈论语郑氏注〉残卷后》又云：“郑氏所据本为自《鲁论》出之《张侯论》，而字句全从古文。”谓其字句全从古文，恐怕也不尽然，因为言“今从《古》”者毕竟有数；而谓郑氏所据本为《张侯论》，则更是为《隋志》及《释文》所误。

《古论》出孔壁，与《鲁论》同属鲁。今二本多异字，只能说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异文。而正因为《古论》与《鲁论》同源，所以篇章相同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亦云：“《古论语》与《古文尚书》同出，章句烦省与《鲁论》不异，唯分《子张》为二篇，故有二十一篇。”与何序“分《尧曰》下章‘子张问’以为一篇，有两《子张》篇”之说相同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注引如淳曰以为“分《尧曰》篇后‘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’已下为篇，名曰《从政》。”虽所言篇名不同，但言所分则同。可见《古论》确分《尧曰》为两篇。

《古论》何以分《尧曰》下章“子张问”以为一篇？以今本视之，当是因为该章文体与上诸章不同的缘故。而事实上，考其文义即可知道，该章文体虽与上诸章异，而所言“五美”、“四恶”，实质上也是为君主立言。如所云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、“择可劳而劳之”、“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”、“不教而杀”、“不戒视成”、“慢令致期”、“出纳之吝”之类，显然是为君者之事，与上诸章如“所重民食、丧、祭”、“宽则得众，敏则有功，公则[民]悦”等主旨无异。主旨相同，自应同篇。可见《古论》多分出一篇，只是传之者未能真正理解文义所致。所以，《古论》必非《论语》原本。何序又言《古论》“篇次不

与《齐》、《鲁》同”，可见其确为后人重新编排（或整理），而非初编之旧。那么也就说明，《鲁论》为较原始之本。至于《齐论》，自应是《论语》原本传齐以后出现的增订本，所以有“烦惑”之言，多出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二篇。需要指出，宋元以来为数众多的学者对《齐论》做过种种推测假设，甚至辑录复原，但皆无实据，不可从信。

《张侯论》未变乱《鲁论》篇章，郑玄亦就《鲁论》篇章，说明郑玄本、《张侯论》及《鲁论》三本篇章相同，至少皆应是二十篇，与出于何晏本之今本《论语》相同。那么今本究竟出自何本呢？这个问题，当从当年何晏等人撰《论语集解》以何本为底本究。

何晏等人当年以何本为底本，《论语序》没有明言，但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亦可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前面说过，《经典释文》引《论语序》，说明其所据用为何晏之本。而今《释文》中多有“郑（或郑本）作‘某’”之语，如《为政》篇“众星共”下云“郑作‘拱’”、“错”下云“郑本作‘措’”等等。“郑本作某”，明显是为校语，标注传本异同而已，总之必非以郑本为底本。那么，也就只能是以《张侯论》为底本了，因为他不可能又回到《鲁论》上去。然而，《释文》又有单言“《鲁》作‘某’，今从《古》”者。如《乡党》篇“瓜祭”下云“《鲁》读‘瓜’为‘必’，今从《古》”，“人傺”下云“《鲁》读为‘献’，今从《古》”，等等。前面我们说到，凡“《鲁》作‘某’，今从《古》”，皆取郑玄之语。那么，所有这些地方，都应是从郑本。又如《尧曰》篇“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”下注：“《鲁论》无此章，今从《古》”，该章也应是从郑玄本据《古论》补入。可见何晏本亦有从郑本者。由此可知，何晏本至少是参校《张侯论》与郑本而成，而非单从一本。那么，今本《论语》，就当是《张侯论》与郑玄本的合校本。又考《释文》言“郑本作‘某’”者凡30余处，单言“《鲁》作‘某’，今从《古》”者17处，说明何晏之本从《张侯论》者多，从郑玄者少。所以，何晏等人当以《张侯论》为底本，以郑玄本为参校，总之非从一本来。看来何晏等人当年确如其《论语序》所言，是以《张侯论》为贵，又集诸家之善。那么，我们就不能说今本《论语》基本上就是《张侯论》，更不能说出自郑玄本。看来传统关于今本由来的认识，并不正确。

今本既出自郑本与《张侯论》，而郑本出《鲁论》、《古论》、《齐论》，篇章基本从《鲁论》；《张侯论》又出《鲁论》、《齐论》，篇章亦从《鲁论》；《鲁》又为较原始之本，那么，今本《论语》就应基本保留较为原始的《论语》篇章之旧。而事实上考诸今本，亦可知其篇章未杂《齐论》。因为《齐论》有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二篇，而以“问王”、“知道”名篇，以例必当有含“问王”、“知道”字样之章。而今本《论语》之中，则不能考见此两章痕迹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